

《王叔銘日記》 的史料價值

倪孟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日記史料的真實性問題

民國以來，文人墨客、達官顯宦勤寫日記的風尚，承襲清代不墜，而國民政府以降的文武高官，有寫日記習慣的人也不少。以目前的研究所知，基於傳統日記「日課」（反省）的功能，或保存、撰寫個人資料的需求等因素，自認思想承襲曾湘鄉的蔣介石，對「記日記」頗為重視，也連帶的要求或影響下屬寫日記以定期「反省策勵」。因此無論在國民政府時期或是後來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之後，許多官員均保有寫日記的習慣，領袖蔣介石亦有每年印發制式日記給高級僚屬的慣例。（註1）所以若就民國史或臺灣史的研究而言，這批民國以來高層軍政人員在當下的時代紀錄，便有可能成為最好的歷史研究素材。

不過歷史研究注重文獻史料的「真實性」，需先辨其載記真偽，方能剪裁使用。而日記之性質通常給人一種「以『自我交流』的型式出發、在『非公共寫作』的心態下完成、隱含『解釋人、事秘辛』的關鍵文字」之印象，因此內容被認定真實可靠，然而實際上卻不見得如此。有部分人撰寫日記的動機是在出版利用，（註2）或預設最終日記是要公開，（註3）也有作者在世時便同意付梓出版，或改寫成回憶錄與傳記的文本傳世，（註4）這類日記（或其所公佈的內容），是否仍屬於在「非公共寫作」的心態下撰寫，則不無商榷之處。（註5）

依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的著錄，王叔銘之日記稱為《王叔銘將軍日記》。但筆者認為逕以日記著者名字直稱為《王叔銘日記》即可，不必加職銜贅詞，就如指稱蔣介石或蔣中正日記，不必冠以「總統」或「先總統蔣公」的道理一樣。依此，本文直接以《王叔銘日記》行文，而不接近史所的著錄資訊。

然而即便是作者不願向外傳佈的日記——如《王叔銘日記》，其記事的真實性、或說其撰寫日記的心態與內容是否有所忌憚或刻意隱避，則是一項可探討的問題。

《王叔銘日記》內容與性質的討論

「王老虎」王叔銘(1905-1998)在1950年代可謂炙手可熱的人物，他本名王鏞，(註6)山東諸城人，黃埔軍校一期畢，並留俄習飛，1931年歸國後開始任職於航空方面職務。1952年繼周至柔任空軍總司令、1957年任參謀總長、1959年後歷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委、中國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駐約旦大使、總統府戰略顧問等職。

王叔銘的日記為王氏1998年身故後，由時任近史所檔案館主任的張淑雅向王氏獨子王鎮洋接洽獲得捐贈，除日記外，王氏身後之勳章、佩刀、圖書等物，(註7)亦一併贈與近史所。該日記一共有六十八冊，記年起自1946年迄於1998年去世之前，跨幅五十三年，約五百萬言。(註8)

實際上王叔銘生前並無意公開日記或撰寫回憶錄，所以他曾向媒體表示要將那些「秘辛」「埋葬於歷史的洪流中」。(註9)有趣的是與王叔銘同時代的一些軍方將領如彭孟緝、俞濟時，似有也相同的「保密」警覺高度，(註10)這或許是那一代軍頭共

有的習慣與特性。據此我們大致可以假定《王叔銘日記》是在「非公共寫作」的心態下動筆，不致有作偽的情形，並可進一步探討像這類無意示人的私密記事，其內容「真實性」的幾點問題：

首先，日記的作者雖在不願公開的意志下，或欲存一紀錄，或為定期反省而寫日記，但這也並不意謂著作者會將所有的事情寫入日記中。以《王叔銘日記》來說，雖是以「差事」記錄為主、間有情感抒發與記事備忘等內容複合其中，受限於日記篇幅，勢必不會將瑣事鉅細靡遺的錄入。但問題在於王氏是否有意地將個人隱私或情感的部分排除於記錄之外，或在日記內摒除不欲人知的一面？若以王叔銘的私生活問題來作例子，老一輩空軍內部一般對王叔銘私領域「性好漁獵」的癖好可說人盡皆知，(註11)但筆者查閱日記的內容，卻未發現王氏有任何不忠的跡證。相反的，卻有駁斥這類「喜歡女人」傳聞的篇幅，(註12)通篇日記充滿了夫妻間相處中相知惜的敬意，及在發生矛盾後的悔恨、反省、辯解與期許。日記反映王氏確有妻子之外的異性相知朋友，也有義女，與一些情同父女的「小大鵬」，甚至為此還曾引起王妻尤祥雲的不悅(醋勁)和夫妻勃谿，但日記卻也顯示王氏對前者並未有男女間的情愛，對後者更僅有父女之情。

其次，關於日記所錄內容，就史源的觀點，不外是個人親身所歷(見而知之)，或

他人相告、聽聞而來（聞而知之）。但問題是親眼所見者未必都是真，更何況傳聞者言？再進一步來看，日記的內容廣涉人、事、物的評陟，但這些評論是來自於個人的親歷的見解、還是旁觀者的分析、抑或是他人的觀點？如此這些代表個人的價值判斷、或是他人與個人的觀點交織而成的內容，又是否公允，並能否作為研究者所引據的史料？就《王叔銘日記》來看，王氏在擔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之時得預戒機，故所記大致可屬親歷之事與個人的品評觀點。而在他職務頂峰時蒙受「不白之冤」，（註13）投閒散置後，尤其是駐聯合國期間，與晚年回臺任戰略顧問時期，王氏所記述及評論國內的人、事的資料來源，則多半來自親朋故舊的報告與（海外）報紙的報導，（註14）但這些來自「知情者言」的觀察與品評卻常是「一家之言」的「秘辛」，且關乎人物的評價與私德，要如何客觀的評析運用，且不至於吃官司，則考驗著歷史工作者的智慧。

最後，吾人或可更深一層去思考「作者（傳主）是否有意識到，他的記事（日記）最終仍有被他人看到的可能」？若作者在下筆的同時有這樣的警覺與體認，則是否便產生了「公共寫作」的心態——有可能會自我設限地遺漏不願人知的私密？這種「日記（隱私）終有一日會為他人所窺伺」的擔憂並非多慮，畢竟白紙黑字的東西，終有被他人看到的機會——至少作者百年後，日記作為遺物，便有可能為子孫閱讀或外人所

接手收藏。因此王叔銘是否也有意是到這點呢？筆者認為張淑雅所觀察到《王叔銘日記》中顯露王氏與兩蔣父子關係的轉變，即是一個分析的切入點。（註15）王叔銘原對蔣介石極為忠誠，與蔣經國也有通家之好，但在1959年王叔銘無預警地從參謀總長職務解任後關係開始生變，日記內對蔣經國利用特務整人的不光明行徑語多批評、連帶亦對蔣介石不顧國家前途、不重視老臣，僅一意為「傳子」鋪路頗有微詞。不過在蔣介石去世，王叔銘歸國改任戰略顧問後，王與蔣經國的關係似又重歸於好，詞句中充滿了對蔣主席與蔣總統的敬意。筆者認為在突遭變故後，孤憤並體認到政治可怖，最後僅希望「平安退休」、辭官養老的王叔銘，（註16）是有可能意識到他日若遭構陷下獄，日記將反成政敵辦案的憑據——五十年代以來兩岸的情治機關利用日記等資料「見縫插針」或入人於罪的傳聞並非無稽。王叔銘從1959年失勢，以及1966年衣復恩遭難的經驗中，應該能得到警惕。所以王叔銘在卸任約旦大使歸國（1975）後的日記，對於人物品評犀利不再，及對蔣經國的態度上更一反前些年的冷言嘲諷，改為執之甚恭的現象，或許則能從這裏得到解釋。

【註釋】

1. 參見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頁

162。其中註 137 則列舉了多篇使用日記撰寫而成回憶錄、訪問紀錄等出版品。又從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王叔銘日記》云：「秦孝儀今年又送來了一冊本年日記冊，國內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往往以送日記冊與否，判其是否仍得上峰之賞識與否，如果年年送而忽有一年不送，即覺得前途有障礙矣」，一則證明當年有官發日記給高級官員的事例，二則顯示當世咸以得到日記為否視為官運的指標。見《王叔銘日記》36 冊（檔案編號：6301003012），1968 年 2 月 10 日，頁 22。

2. 依鄒振環，〈日記文獻的分類與史料價值〉，網址：http://bigfish.blog.hexun.com.tw/5423324_d.html 所述，胡適的《胡適留學日記》，便是有目的，在一開始便有出版的意圖而寫，《李慈銘日記》與《曾國藩日記》也是撰時便準備日後發表。
3. 依鄒振環的分析，周作人的日記剛開始是以「非公共寫作心態」，寫給自己看，但後來卻決定死後公開，「留給別人看」，甚至 1949 年後還根據手稿影印本修改過一次。此外蔣介石的日記似乎也類同，他應該在廿、卅年代後便有意識到日記將給後人看，並且蔣的日記至少有給其秘書閱覽使用，以編寫《民國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或後來的《先總統蔣公年譜初稿》。
4. 前者如郝柏村便出版了他的部分日記兩種，不過從書前的序言可知在付梓時郝氏是有考量而對內容有所刪節。後者如外交體系沈錡、陸以正、錢復等之回憶錄均是參考日記寫成，其中陸、錢的回憶錄為重新的撰寫；而沈錡應該很早便有利利用日記撰寫（或出版）回憶錄的打算，回憶錄除第一冊外，其餘應是以日記的原文前後稍加連綴，因此保有許多當年沈氏對人對事的評價。見：郝柏村，《八年參謀總長日記》（臺北：天下遠見，2000 年）、郝柏村著、王力行採編，《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臺北：天下文化，1995 年）、陸以

正，《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臺北：天下遠見，2002 年）、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一：外交風雲動》（臺北：天下遠見，2005 年）、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二：華府路崎嶇》（臺北：天下遠見，2005 年）、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冊一——冊六（臺北：聯經出版社，2000 年）、沈錡，《我的一生：沈錡回憶錄》冊七——冊十二（臺北：聯經出版社，2002 年）。

5. 這類的狀況便很難說日記是在「非公共寫作」的心態下完成，蓋作者難免有許多的考量，故作莊重而避談私事與秘辛，甚至誇大、隱瞞，或有意捏造偽者，亦在所難免。
6. 按，王叔銘之本名應為「王鏞」，這可從黃埔軍校一期同學錄及王氏的兄弟名字俱為單名且有「金」字部首證明（由日記內容可知其四弟王鉢、五弟王鉞、六弟王鈞）。但一般常以「王勳」易之（也有用「勛」者），如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頁 126 之介紹及中華民國航空史研究會所訪問羅中揚的回憶，因此可能王氏曾有通用「王勳」一名。但令人疑惑的是，如黃埔軍校一期同學錄時使用本名「王鏞」，則應無張淑雅文所稱「因同名者多，奉軍事委員會以字行」的理由。參見湖南省檔案館校編，《黃埔軍校同學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11；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3 年），頁 320、321。
7. 近史所大概是 2001 年取得這批資料。而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所見館藏空軍相關的書籍如同學錄、及戲曲類的書籍如戲考多為王氏遺贈。
8. 接近史所完成之《王叔銘日記》電子資料庫的字數統計約共四百七十九萬餘字。若細看內容，可知王氏雖從 1946 年 1 月 1 日開始記事，但可推知其記日記，茲始於更早，可能因戰亂等因遺失；其次，日記中 1949、1957-1963、

1967-1968 等年均有兩本以上的日記（其中 1949、1957 年更多達四本），甚至有同時記述兩本日記的情況（如 1959 年），這可能是其於不同單位或地點所記；其三，1972 至 1975 年 7 月 5 日前這段期間的四本日記，也就是王氏 1971 年底離開紐約在駐約旦大使期間的部分，疑似原本散佚不在檔案中，乃後來整理檔案時發現補入，故編碼續尾為 65-68 冊；最後，近史所完成並上線的數位檔案疑似僅做到 1995 年，可能是王氏晚年患失智症，所記無事，故省略之。

9. 見趙莒玲，〈小老虎參見校長前參謀總長王叔銘早逢貴人〉，《中國時報》（臺北：1990 年，版 15）。
10. 彭孟緝曾在口述訪問時告訴訪問者「〔按，指國光等計畫的反攻案〕像這種秘密多的很，能公開嗎？」無獨有偶的如俞濟時也曾對劉紹唐表示：「〔按，指《傳記文學》〕可是你們知道的都是假的，為什麼？真的事情我們不會告訴你，我們會守著秘密，把這秘密帶到棺材裡面去，你們也不知道，所以你們講了半天，不管是好的壞的，根本不是真相，真相你們不知道，我們也不告訴你」。以上參見賴澤涵、許雪姬，〈彭孟緝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日據時期臺灣人赴大陸經驗》（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 年），頁 355、與《李敖大全集》網頁：<http://wx.cclawnet.com/liaodaquanji/zi/mydoc396.htm>。不過有趣的是彭孟緝口中直稱「不能公布的秘密——國光計劃案」，十年後卻成為軍方主導下之口述史的重要成果。如此這類四十年前的往事，果真是機密乎？是個人之思想保守？抑或是藉口檔案機密力阻真相發覺？相信自有公斷。參彭大年，〈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 年）。
11. 類似的傳聞很多，且可能從軍政部航空學校（後改為中央航空學校，簡稱航校）的時期便傳起。如羅中揚的回憶錄中便有提及兩點，一

是其在航校時王叔銘就被同仁冠以「那個玩姑娘的」稱號；另一則是王氏在臺灣各地都有紅粉知己，這個傳聞在臺灣的空軍與軍眷圈中也流傳甚廣。見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頁 320（註釋四）、297、298。

12. 如 1959 年 7 月 29 日記：「我是一個平民官，一向是民主作風，且不拘小節，從來不擺官架子，而在中國的社會裡不適宜，一二年來被人家以『喜歡女人』四個字，作了有計劃的破壞，被人家說的亂七八糟，無中生有，此種有計劃之破壞，一方面已滿足了官僚政客，同時被共匪笑掉了牙，恰恰是上了共匪的當，有了此次經驗，明瞭了中國社會的殘酷，更明瞭了中國政治上的殘酷」。參見《王叔銘日記》22 冊（檔案編號：6301002009），1959 年 7 月 29 日，頁 127。
13. 王叔銘 1959 年中從參謀總長去職，表面上似以已任滿兩年，正常之調動，但實際上事情發生得頗為突然，事前未有跡象。事發後數年間王叔銘在日記中也有紀錄下幾種傳言與可能性。而此「不白之冤」的說法可見王叔銘親信羅中揚的評論，如劉永尚、黎邦亮，〈驀然回首感恩深——羅中揚將軍回憶〉，頁 296。
14. 王叔銘在此時常往來的對象主要是其軍校同學與空軍舊屬。在王氏駐外期間不時有「臺灣來客」過境拜訪，並帶來國內政情「秘辛」。另外王氏周遭也不乏空軍舊屬來訪，並告稱空軍或華航內部的情況。
15. 參見張淑雅，〈從日記看王叔銘的人際關係：蔣氏父子、僚屬與美軍〉，頁 123、141-142、148-149、159。張氏認為《王叔銘日記》晚年的轉變乃是王叔銘將對蔣介石的忠心轉移到兒子蔣經國身上，並認為這是種「對蔣家的情感與認同」。不過竊以為若單純以「對蔣家的情感與認同」來解讀王叔銘對蔣經國態度的轉變稍有不妥。蓋蔣經國死後，王氏在日記內對繼任者李登輝敬重依舊，且對稍後襲來的「主流

非主流政爭」也沒有偏倚的評論，所以若僅從「對一姓的忠誠」這點似不足以解釋王叔銘對李氏的恭敬。因此筆者認為這種態度的轉變或許是王叔銘對於「總統」或「黨主席」之「名器」的敬重使然，抑或是他暮年心態真有轉變。但也不無刻意隱藏對當局的不滿，而下筆有保留的可能性。

16. 見《王叔銘日記》32冊（檔案編號：6301003008），1965年2月7日，頁21。同年3月21日，頁42亦載「……國事如此，時局又如此，將為之何？將為之何？我想最好還是早日請求退隱，是為上策」。





蟲魚的說書時間

總統禮品系列專題演講

主講人：邱建一（藝術史學者）



場次	日期	專題名稱
1	05/02 (四)	奧地利工藝美術運動的典型代表：圓頂杯
2	06/06 (四)	馬雅文化偉大的遺產：哈博曆與佐爾金曆
3	07/04 (四)	法國皇家獵場的優雅：楓丹白露一景
4	08/01 (四)	航向藍色的愛情之島：邱比特盒
5	09/05 (四)	庶民大眾的袖下彩瓷：青花瓷碗
6	10/03 (四)	極盡奢華的貴族品味：雕花剔紅牡丹瓶
7	11/07 (四)	造像藝術的典型：釋迦牟尼金銅佛
8	12/12 (四)	青瓷系的演進與傳播：青瓷象嵌仙鶴花草紋蓋碗

時間：14:00~16:00 (13:15開放入場)
地點：國史館4樓大禮堂